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75千字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37 定价：1.35元

目 录

- 陈独秀和《新青年》.....丁守和 (1)
建党初期的陈独秀.....冯建辉 (36)
陈独秀评价的评价
.....王维礼 杜文君 (51)
论“五四”和党创立时期的陈独秀.....王金铻 (65)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张静如 (83)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戴鹿鸣 (103)
“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袁 谦 吴家林 (136)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彻底反帝思想.....吕明灼 (151)
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陈善学 (164)
鲁迅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阮 铭 (182)
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陈安湖 (198)
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林非 曾普 刘再复 (242)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陈 涌 (261)
论鲁迅对奴才主义的批判.....张 琢 (293)

-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耿云志(310)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 张昌熙 史若平(341)
论五四运动时期的胡适 胡曲园(361)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丁桢彦(384)
五四时期的吴虞 罗孟桢(396)
论吴虞 赵清 郑城(413)
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者和保护者 耿云志(429)

陈独秀和《新青年》

丁守和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它从一九一五年创办到一九二六年停刊，前后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它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它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它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整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伟大的功绩。

《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分不开的。他不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而且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培植了《新青年》，《新青年》也造成了陈独秀的声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新青年》的贡献和缺陷，变化和发展，都是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关的。陈独秀后来成了历史的罪人，然而他在《新青年》时期的重大作用却无可否认，也无需否认。本文试图通过《新青年》，研究分析一下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发展，及其对《新青年》和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显然，这只能是一个尝试。

—

《新青年》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黑暗岁月中诞生的。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岌岌可危。袁世凯在镇压了二

次革命之后，极力加强其反动统治，悍然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下令尊孔读经，积极进行帝制活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深入。袁世凯不仅不抵抗，反而企图依靠它的支持登上皇帝的宝座，公然与之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帝国主义分子宣扬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封建卫道者叫嚷恢复帝制，“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在社会上，孔教会、孔道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现；鬼神迷信之说极其流行。可是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却发生了深刻分化。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虽然坚持斗争，但仍提不出明确的革命纲领；有些人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成为新贵；有些人在复古尊孔逆流面前重新承认封建思想的权威。许多人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的怀疑和不满，而努力探求摆脱现状的出路。这种探求的积极成果，就是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适应这个趋势而出现的。

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清楚地看到，民主政治并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要回到专制，也不是与封建势力妥协，而是要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按照陈独秀的说法：“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内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①他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过去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②他们认为，不使人民觉悟，而只是空喊宪法、国会，“张空拳绳民贼于法度”是毫无用处的^③。因此他们主张“使吾国党派运动进

① 《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② 《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1916年1月

③ 《时事杂感》，《新青年》3卷4号，1917年6月

而为国民运动”，并决心为促进国民的自觉做工作。同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又看到，那些阴谋复辟帝制的人，或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人，都热衷于宣扬孔教，从思想上奴役和麻痹人民。于是他们认为救国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封建思想对人民的重重束缚，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陈独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因此，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便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开始攻击那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在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具有这种认识的第一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并参加了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任安徽师范学堂校长，一九一三年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曾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一九一五年回国，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新青年》），任主编。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应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来北京，并予扩大，陈仍任主编。因此，早期《新青年》主要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认识和观点。

《新青年》一创刊就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历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并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贱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

^①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他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呼吁青年，坚持人权和科学的精神，“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这是《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已经包括在这儿了。

民主和科学曾经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思想的先驱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指出“人类只有通过新的科学，才能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十八世纪，法国民主思想的先驱卢梭发出“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处处都在桎梏中”的呼声，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和“政权应由人民掌握”的理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思想家、科学家也阐明了科学、理性和民主的意义。这些先驱者提供的精神武器，为摧毁野蛮愚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青年》所宣传的民主和科学，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的，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的范围。历史安排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场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没落了，民主和科学已经不再是革命的精神武器，而是维护资本统治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在中国的“再发现”，却仍然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在西方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却还很新鲜。中国人

接触西方文化已经几十年，但认真聘请德、赛二先生到中国来的，则是《新青年》。《新青年》就是用这两个精神武器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掀起了思想革命的巨浪。应该说，请来德、赛二先生，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陈独秀的一个重大贡献。

《新青年》在开始时并没有针对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进行直接的鼓动，而是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陈独秀认为反对封建制度和主张民主的思想斗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因而没有提出反袁的口号。但是袁世凯搞帝制活动，《新青年》大力宣传民主自由，主张建立“惟民主义”国家，实际上仍是对时政的抨击。袁世凯死后，《新青年》又对继起的帝制活动进行了一系列攻击，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并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和反封建礼教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新青年》强调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②只有这样，才能“出黑暗而入光明”。所以《新青年》宣传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实际政治的影响，而是它展开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

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封建礼教是并行而起的。由于袁世凯称帝、康有为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新青年》的斗争锋芒很快指向了以维护封建专制为中心的孔教和孔学，喊出了打倒旧礼教的战斗呼声。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中，系统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

① 《通信》，《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② 《袁世凯复活》，《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

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他号召青年、妇女打碎奴隶的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接着，陈独秀又连续发表文章，驳斥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①。他反复论证了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之道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主张民主国之祀孔正象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卢梭一样的荒诞不经。他痛切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些反对封建礼教，主张民主思想的宣传，说明陈独秀当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

当然，把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把“伦理的觉悟”看作“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不能说是科学的；把这场思想革命说成是“国民性改造”或“民族性改造”，也是不确切和不妥当。但是，这种认识有其正确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因为在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存在几千年，根深蒂固，流毒深广，且被奉为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戊戌变法时代虽然宣传过民权思想，但那是在同封建思想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辛亥革命时提出了民主主义的口号，但当时的革命者无论在理论上或

^① 见《新青年》2卷2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3号《宪法与孔教》，4号《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5号《再论孔教问题》，3卷6号《复辟与尊孔》，4卷3号《驳康有为共和评议》等。

实践上主要是把清王朝看作革命的对象，而对封建思想却作了妥协，民主主义宣传在激烈的反满声浪中淹没了。封建主义思想一直未受到严重冲击。所以说，从戊戌变法时代的“托古改制”到五四时代的反对封建礼教，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在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易白沙、李大钊、吴虞、鲁迅都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参加战斗。易白沙指名批判孔子，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被“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①李大钊揭露封建社会二千年来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摆脱“僵尸枯骨”，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为“素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②；并鼓励青年为追求真理和促使社会进步，要“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③，表现了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吴虞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系起来加以攻击，指出儒家教忠教孝是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④。鲁迅稍后才参加战斗，但他一出现立即成了彻底反封建的战士，以他的“呐喊”助长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威。他的《狂人日记》象烈火一样烧毁了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全部假面，无情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他发出誓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留在世上”，要求“救救孩子”，要求人们起来为“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

反对旧礼教的思想斗争，在于唤醒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争取人权自由和个性解放。当时提出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格主义等等，实际上都是以人为中心，

① 《孔子评议》，《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② 《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

③ 《新生命诞生之努力》，《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

④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说孝》，《吴虞文录》第15页

要求使人成为“真的人”，独立自主的人，独立思想的人，而不是奴隶，不是附属品。当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却是极为需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都是奴隶，都是顺民，都是迷信、盲从、愚昧、落后、无知的人，或者如鲁迅所说都是在“铁屋子”里“熟睡的人”^①，那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只能任人奴役任人宰割了。在那封建专制的年代，在那封建的伦理道德、宗法思想、传统观念的网罗密布的黑暗社会，《新青年》犹如狂飙突起，放声呼唤：打碎奴隶的枷锁，打碎专制制度，要独立自主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这声音真是震聋发聩，扣人心弦，催人猛醒，奋起斗争。《新青年》宣传民主思想的重大意义就在这里。

《新青年》在大力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科学思想。当时的赛先生主要还不是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发挥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和愚昧。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散布种种迷信妄说，愚弄人民，反过来又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阻止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所以反对迷信成了反对封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陈独秀的言论看，当时宣传科学的含义主要有这样几点：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②二、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天罚、天幸”的天命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三、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指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③使主观思想合于客观实际，以达到“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四、主张坚持真理，破除偶象，指出一切偶象都是无用的骗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7页

② 《新青年》1卷1号《敬告青年》，2卷5号《再论孔教问题》

③ 《敬告青年》，《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人的，“都应该破坏”，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做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信仰”的统一。^①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力求进步。“自宇宙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②鼓励青年从消极保守退缩中摆脱出来，建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一九一八年《新青年》还对上海的《灵学》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驳斥了它散布的所谓“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

《新青年》创刊前后，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学界。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宣扬“代圣贤立言”，江西派诗词刻意摹仿。《红楼梦》等作品的优良传统不仅没有发扬，却出现了大量低级趣味的色情小说和黑幕大观。各种教科书、应用文、报章杂志也多是文言文的天下。总之，几乎是所有用得着文字的地方，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就通过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从四面八方向人们特别是青年进攻，腐蚀他们的思想，麻痹他们的意志，阻碍他们与现实社会接触，严重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又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文学革命，向封建文学和文言文进攻。

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革。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反映，形式的改革则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倡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在文学运动中，胡适首先提出中国文学需要改良，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主张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③主要是文体改革和白话文。他提倡白话文，并最先用白话写诗写文章，在当时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很高的声誉。但是，他提倡白话文很不坚决，曾一再宣称“决

① 《破坏偶像论》，《新青年》5卷2号，1918年7月

② 《敬告青年》

③ 《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

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①表现了他的改良主义立场。提出文学革命并把文学革命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的是陈独秀。他说：“盘据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高擎“文学革命军”大旗，阐发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反对利用文学作为宣传封建思想的工具，要求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他号召中国文学界应该出现一批象欧洲的虞哥、左拉、狄铿士……那样的反对旧文学的战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他主张白话文也是很坚决的，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胡适后来也不能不承认：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至少还需要经过十年的讨论和尝试”。^④

继起响应文学革命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而鲁迅则以他的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钱玄同认为中国旧文学“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对现代中国只是有害而无益，反对读中国书，主张根本废除汉字，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钱玄同和刘半农关于王敬轩来信和复王敬轩书的“双簧信”，是文学革命中的著名事件，深刻反映了他们对旧文学和旧文学卫道者的仇恨和发展新文学的决心。在文学革命中，鲁迅把反对旧礼教的斗争和白话文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革命精神。他的作品深深打中了旧社会的弊病，到处鞭挞旧事物，呼

① 《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②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③ 《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④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2集，第2卷，第196页

唤着新生，成为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典范。陈独秀当时就曾说过：“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① 鲁迅当时没有着力于文学革命理论的建设，但只有他的文学创作成果才真正代表着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伟大传统。文学革命的兴起不但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思想的解放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使新文化运动更为深入人心，朝气蓬勃。

《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封建势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于是对它的迫害便接踵而来。那些封建顽固派、伪君子、假道学纷纷出来，大惊小怪，八面非难，疯狂反对《新青年》。他们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他们诬蔑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动摇了中国文明的根基，造成了思想混乱和道德败坏；大骂提倡新思想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是“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并且企图借助反动派的武力实行镇压。封建分子的这些攻击正好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新青年》所展开的这场斗争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但是《新青年》的战士们在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压力下并没有屈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顽固分子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驳斥和批判，广大知识青年和进步舆论也对政府迫害新文化运动的企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因而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猛烈地展开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的非难，对《新青年》创刊以来的宣传作了一个实际上的总结。《答辩书》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

^① 陈独秀《致周作人的信》，1920年8月22日

(Science) 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进而宣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表示了《新青年》的战士们在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无畏的决心。

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又一次得到了多少类似的重演。《新青年》的宣传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在广大青年中掀起了追求真理、追求新知识的热情，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学习科学和革命思想的迫切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这是《新青年》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陈独秀的重大贡献。陈独秀在反封建主义斗争中是坚决勇敢的，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迷信，宣传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提倡平等、自由，个性解放，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因而被合理地看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是，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当时各种哲学思想和流派面前，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